

傅宇東譯

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

言行出版社印行

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

列 寧 著 傅子東 譯

言 行 出 社 版 印 行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七 年 六 月

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

著者列 寧

譯者傅 東

發行者
上海北河南路二四六弄七號
言行出版社

廣州鹽運西一街十二號

漢口 廣州 重慶 上海

總經理
生活書店

西安 長沙 成都 梧州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六月

譯者序言

列甯是世界通史上，特別是世界政治史上、經濟史上、社會史上，劃時代的人物。在這部著作中表現出他的徹底的、深透的、辯證法唯物論的見解，支配着他的行動及關於政治、經濟、社會他的一切理論的；所以這部著作當然要與他的事功在人類歷史上同一不朽。

一

這部著作的理論非常艱深，牠即使不是我國翻譯的歐美著作當中一部最難翻譯的著作，也斷然是最難翻譯的著作當中之一。原著的譯本已有兩種，一在明日書店出版，一在辛壘書店出版；此外尚有差不多全部節取原著的阿德拉斯基的哲學的唯物論的譯本，滬濱書店出版。所以連我的這個譯本，可以說有四種譯本了：此後是否尚須第五種譯本出現，譯者敢誇大地說，決然是不必要了。

譯者的翻譯的方法，曾在自己翻譯的近代資本主義進化論（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序言上述說過，就是：「想要從信實和通俗兩方面大膽地努力于造成一種精當的譯文體裁，即，用通俗的和嚴密地適

合文法上規則的詞句逐字照原文譯下來，同時，力避文言和西文句法的穆入。」

在近代資本主義進化論的序言上還述說過：『本書譯文既然無句不與文法上規則適合，一切詞類如名詞幾完全是多音字，形容詞、動詞、副詞大半是多音字，聯絡詞和介詞也有許多是多音字；那麼，不遠的將來，由採用羅馬字母爲我們拼音的字母再進一步把客體（羅馬字母）改變爲主體並將原來的主體（我們現時的字）驅逐開，使以形式代表意義的我們現在文字演進爲以聲音代表意義的我們將來文字時，這個譯本立刻可毫不費事地用將來的文字重行排印起來。』我國文字的重要缺點，據譯者的意見，只有兩種，一爲名詞無多數與單數的區別，一爲動詞無分詞的變化。但是將來的文字形成時，在名詞的語尾加一無音的S來表示名詞的多數，在動詞的語尾加一無音的G來表示動詞的變化爲分詞，便可以補好這兩種重要的缺點。這個將來的文字，譯者確信，遲早必定實現；在此處，爲題目和篇幅所限制，不能詳述牠的必定出現的理由。反對中國文字的改革者，以爲採用拼音的文字，中國數千年的文明將要滅絕；但是歷史告訴我們，雅典的文明今仍存在，並且將要永遠地存在。

二

譯者在青年時代誦讀韓非子，非常佩服他的理論的透闢，他實在是中國歷史上僅有的最偉大的唯

物論的政治哲學家。現在極簡單地敘述他的最重要的思想，表明譯者將本書敬獻給他的緣由。

他對於政治的施行，重視貨財，說道：「夫古之讓天下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古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濃厚之實異也。故飢歲之春，幼弟不饑，饑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客骨肉愛過也（不是對於疏客與骨肉間的親愛有過誤），多少之實異也。是以……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士橐，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爲之政。」（五蠹，第四十九。）

他駁難「人存政舉，人亡政息」這個主張，說道：「且舜救敗，堯年已一過，三年已三過；舜壽有盡，天下過無已；以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矣。賞罰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賞，弗中程者誅。令朝至，暮變，暮至，朝變，十日而海內畢矣；奚待堯年？」（難一，第三十六。）他駁難「以身率下」這個主張，說道：「嚴親在危，輕犯矢石，孝子之所以愛親也。孝者愛親，百數之一也；今以爲身處危，而人尙可戰，是以百族之子于上，皆若孝子之愛親也：是行人之誣也。好利惡害，人之所有也；賞厚而信，夫人輕敵矣，刑重而必，夫人不北矣。」（難二，第三十七。）他表明仁義、慈愛和德惠在政治上的無用，說道：「且民者固服于勢，寡能懷于義。仲尼天下聖人也……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不乘必勝之勢，而務行仁義；……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服勢之

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數也。」（五蠹，第四十九）『母之愛子也倍父，父令之行于子者十母；更之于民無愛，令之行于民也萬父母。積愛而令窮，吏威嚴而民聽從。』（六反，第四十六）『凡人之生也，財用足則墮于用力；……財用足而力作者神農也，夫民之不及神農，亦明矣。……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于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爲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爲皆如老聃也。』（同上）

說到他的最精深的法治的理論，我們在難勢第四十上讀道：『世之治者不絕于中，吾所爲言勢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爲桀紂。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世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世亂也。』又在忠孝第五十一上讀道：『堯舜湯武或反君臣之義，亂後世之教者也。堯爲人君，而君其臣，舜爲人臣，而臣其君，湯武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夫所謂明君者，能畜其臣者也，所謂賢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職，以戴其君者也。今堯自以爲明，而不能以畜舜，舜自以爲賢，而不能以戴堯，湯武自以爲義，而弑其君長。……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賢臣而弗易也。則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今夫上賢、任智、無常，逆道也，而天下常以爲治；是故田氏奪呂氏于齊，戴氏奪子氏于宋，此皆賢且智也，豈愚且不肖乎。是廢常、上賢則亂，舍法、任智則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賢。』又在同篇上讀道：『天下太上之士，不可以賞勸也，天下

太下之士，不可以刑禁也。然爲太上士不設賞，爲太下士不設刑，則治國、用民之道失矣。」

但是韓非所以能夠集法家學說的大成，大半是因爲他對法術兩者能夠一樣地重視，並關於牠們有獨到的見解。他在定法第四十三上說道：「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謀羣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于官府，刑罰必于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此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在五蠹第四十九上又說道：「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罰，得操其柄，以修明術之所燭；雖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於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衆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羣官無姦詐矣。」在顯學第五十上又說道：「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爲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爲非也；恃人之爲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爲非，一國可使齊。」

他還主張把社會的毀譽拿來輔助國家的賞罰，在八經第四十八上說道：「賞、譽同軌，非、誅俱行。」在五蠹第四十九上又說道：「譽輔其實，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今則不然……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謬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實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工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故

令尹誅而楚楚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

此外，他因為祖國非常微弱，須集中全體人民的力量來應付強鄰，悲憤地把儒、俠當作磐石和象人看待。這樣的議論，在這裏可以不必引證了。

三

韓非所謂術，性質上與近代國家的選舉權（包含創制權、複決權、撤銷權、等等在內）是一個東西，都是一種運用法制的工具，換一句話說來，是法制的實施之推動力。在專制時代皇帝握有這個推動力；在近代國家，大概說來，一般民衆（在某種範圍內），或資本階級，握有這個推動力；在現在的意大利和蘇維埃俄羅斯是一個政黨握有這個推動力。

意大利的棒喝黨的專政可以說是資本主義下的民主主義的反動，蘇維埃俄羅斯的共產黨的專政却實在與前者的專政兩樣；從有皇帝的專制政體變革為國家社會主義的共和政體，如果這個推動力一下便移轉到毫無新政治組織上的訓練的一般民衆手裏，這個巨大的新政治機器恐要不能夠靈活地運轉着，所以俄國共產黨的專政從迅速而有效地推進新政治組織說一定是必要的。

資本主義下的民主政治或資本主義下的議會政治，依據俄國共產黨的見解，完全是資本家階級

支配着的；但是人們如果相信英國和美國，甚至法國和德國，可以由運用議會政治將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漸漸變革爲（國家）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那麼，這個見解，在他們看來，不必然完全是正確的。

中國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在理論上是沒錯的，其所主張的訓政，在理論上也是必要的。不過這樣的專政和訓政的實行數年來遭受了事實的嚴酷的批評。因了這樣的批評，就是國民黨的首領也主張結束訓政，把政治上的權力歸還給人民。但是專政和訓政的必要是一件事，實施牠們的無能又是一件事。如因實施的無能，而懷疑牠們的必要，這便是倒果爲因，在論理上是謬誤的。

共產黨和無政府黨經濟上有一個共同的主張，即，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個主張，在近代曾有一些烏托邦的社會主義者小規模地把牠試驗過，結果，通統失敗了。不過俄羅斯共產黨的經濟上的設施，是對一切重要的產業由國家統制起來，即是國家社會主義或國家資本主義的實行。在這樣的經濟組織下，牠的生產力的發展，如果單指的是勞動家的能率的增進，那便一樣地爲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下資本主義的經濟學的法則所支配。生產工具的所有人雖由私人改變爲國家，牠的運用的法則却不是不會兩樣的；勞動家的生產能率仍須有現實的物質的刺激，纔能夠增高起來。

從近代各工業先進國的產業發展史看來，特別是從德國的產業發展史看來，我們可以知道，在世界資本主義已進到金融資本主義的時期，即進到帝國主義的時期，經濟落後的國家，除了以國家社會

主義或國家資本主義的方法來發展自己的產業和抵抗帝國主義的經濟掠奪而外，決找尋不出其他發展產業的有效途徑。在德國努力于振興自己的商工業的時候，世界資本主義方達到工業資本主義的時期，所以牠能夠因採用保護政策，追趕英國工商業的發展。在現在帝國主義的時期，資本主義下的大組織，如托辣斯、辛笛加、加特爾，以及其他各種聯合，就是後進的產業國，以國家的力量與牠們競爭，尙恐失敗，例如蘇俄政府專賣煤油，不能夠對抗亞細亞煤油公司和美孚煤油公司。

中國的經濟階段是正由農業進而爲工業，有些人不滿歐美的物質文明，主張中國應專振興農業，這與欲把農業的經濟階段倒變爲畜牧的經濟階段，一樣荒謬，一樣不可行。農業的經濟階段的生產力與工業的經濟階段的生產力大相懸絕，恰如畜牧的經濟階段的生產力與農業的經濟階段的生產力大相懸絕似的。生產力大相懸絕，一切經濟組織的上層建築物，如文物、制度、軍備、以及其他等等，也相應地大相懸絕。

所以經濟的發展，是物質的和精神的文明的進步。在現在金融資本主義的時期，任何國家，具有發展工業的資源的，除開採行國家社會主義或國家資本主義而外，想要在短期間有效地把自國的工業和其他產業發展起來，斷然是不可能的。說到中國，這也決無例外。

譯者從來未用文字發表過政治上或經濟上的見解，上面的說話，是譯者這樣的發表的第一次，但

也是純然學理上的見解。

四

這個譯本是在兩年前就英文譯本寫完的，當時滿擬將後在校對這個付印的譯稿時，用法文譯本仔細審核一遍，並打算做一篇長序來總述各章的精華。但是在本年付印時，譯者因人事冗忙，請求了知友李達先生以德文和日文譯本詳細審核，並以總述各章精華的任務懇託他幫做。李先生因他的眼病時輟時發，只擔任了第一種工作，而他答應做的第二種任務也就擱置下了。這是譯者應向讀者抱歉的。

原稿曾經李先生完全審核一遍，從英文翻譯弁言到正文第二章最後一次的校對工作是他做完的，自正文第三章起至附錄最後一次的校對工作是譯者做完的。但是譯者編索隱時，又將本書從頭到尾細讀一遍；文字上復有許多修改。這許多修改，因紙版打好，只得將牠們排列成勸誤表。

李先生對於這個譯文，有許多修正，這是譯者應當對他致深厚的感謝的。有兩三句譯文錯誤，他曾加以很好的改正；有好幾句譯文不順口，及譯文的字眼有文言的意味，他都會一一加以改易。至于專門名詞，尤其是人名，以及一二學術上的譯名，他也細心修改過。

本書很難了解，但是讀者如把拙譯的歐洲哲學史（神州國光社出版）先看一遍，那麼，再覽觀牠，比較上便會覺得容易懂得些。

傅子東 民國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英文翻譯的弁言

(一)本書對於確立俄羅斯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哲學基礎的歷史，是極有價值的貢獻。不幸地列寧這本著作，直到現在，外國讀者尚未讀到。但遲一點讀到，比較始終不能讀到要好些。現在英文譯本出現，許多讀者都能閱覽牠了。

人們應明白：在第二國際的隆盛時候，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辯證法的唯物論——不特未被歐洲社會主義的政黨深切地注意，並且甚至還受牠們的輕侮。

德國社會民主黨之理論的中央機關雜誌，即坎茨基 (Kautsky) 主持的新時代 (Neue Zeit)，關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問題，沒有採取確定的、一貫的態度，雜亂地刊載新康德派 (Neo-Kantian)、馬赫派 (Machian)、唯物論者的論說。當時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領域內，俄羅斯馬克思主義者已取得指導的地位。這只要說起下面一件事就夠了，即前世紀九十年代，對於奔恩斯坦 (E. Bernstein) 和西米特 (K. Schmidt) 的新康德主義的論爭，是由那個在新時代上發表過許多卓絕論文的蒲列哈諾夫 (G. Plekhanov) 擔負完全責任的。

修正派的『批判潮流』，不久在俄羅斯『合法的』馬克思主義的運動中，尋見了牠的回響。斯特魯夫（Struve）、圖干·巴蘭諾夫斯基（Tugan-Baranovsky）、布爾加可夫（Bulgakov），是俄羅斯新康德主義的代表。在幾許時期，革命的、正統派的、馬克思主義者——尤其是蒲列哈諾夫和列甯——爲純粹戰術的緣由，以『友誼的』而又十分剛毅的態度，實行與他們鬥爭。然而無產階級的壁壘中，這些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的代表，不久就顯露出他們的本來面目，永遠反背無產階級的運動了。

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前的時期，形成了馬克思主義中新修正派的運動。這叫做馬赫主義（Machism），由波格達諾夫（A. Bogdanov）和魯納察斯基（A. Lunacharsky）領導着。列甯的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就專事批判那種運動的。

在這個弁言中，我們的目的，不是要評定這個列甯的名著的價值。這個名著因社會民主黨內的紛爭而出現，牠的成立史與這些紛爭的歷史相關聯着；我現只打算簡單地概述牠如此成立的歷史。

（一）現在我們知道，列甯是在前世紀九十年代之末流配到西比利亞（Siberia）而滯居蘇薩斯可義（Shushenskoye）的僻遠的村落時，纔開始做哲學的研究的。

在一方面因蒲列哈諾夫與奔恩斯坦和西米特的論戰，在別方面因俄羅斯新康德主義者（斯特魯夫、圖干·巴蘭諾夫、布爾加可夫）的活動，列甯認明爲獨立判斷論等的問題必須埋頭研究哲學。我

們如要避免誤解；就必須特別注意列甯對於那個論戰，是始終主張一貫。誠然，他從起頭就贊同正統派的馬克思主義的辯護者，與蒲列哈諾夫一致，對抗新康德主義者，甚至對於蒲列哈諾夫攻擊俄羅斯新康德主義的躊躇態度表示不滿。例如他在一八九八年九月二號（在流配中）寫給婆特里蘇夫（A. Potressov）的書信中說道：『我很詫異唯物論史（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Materialismus）的作者（即蒲列哈諾夫——德博林）沒有斷然攻擊俄羅斯文獻中新康德主義者，致任斯特魯夫和布爾加可夫爭辯哲學上某某特定問題，彷彿他們的見解業已成為俄羅斯學子的見解當中所不可少的部份。』（“Leninsky Sbornik,”〔俄文本〕，第六冊，八到九頁。）

列甯在一八九九年四月二十七號寫給婆特里蘇夫的另一書信中說道：『斯特魯夫和布爾加可夫所迷戀的馬克思主義中，這個新批判潮流全部……在我看來很有疑問。這個潮流構成對於反獨斷的意見等等的「批判論」之誇大言詞，沒有積極的任何批判效果。』（同書二二頁）

人們不應推想列甯在當時只傍觀那個「論戰」。反之，他十分活潑地參加反新康德主義者的鬥爭。如果他沒有活潑地參加純粹哲學上的論戰，那必在經濟學的領域內猛烈地對抗過他們，在經濟學的領域內，他們這些修正派會從康德主義的認識論的觀點，批判馬克思學說的各部份。

列甯在西比利亞的流配中收到當時的文獻很為遲慢，常常因此焦慮。他的知識，許多都是從通信

得來的，自然在起頭他無論如何對於那些爭辯的問題不得不緩下最後的判斷。這件事，說到奔恩斯坦的著作及斯特魯夫和其他新康德主義的著作，就是實際的例子。但從他一八九九年六月二十七號寫給婆特里蘇夫的信看來，我們知道他會得到最新的出版物，孜孜不倦地研究牠們，並從事熟讀古典的哲學文獻，包括康德的作品在內，康德的學說在當時很有勢力。在那封信中他說道：「我反復誦讀唯物論史等等著作，很感興趣。我也看過同一的作者（在新時代上）所發表的反對奔恩斯坦和西米特的論文，……及我們康德主義者（斯特魯夫和布爾加可夫）所讚賞的斯達勒爾的經濟和法律（Stammle's Wirtschaft und Recht），並採取斷然擁護這個（元論者）蒲列哈諾夫——德博林）的態度。我對斯達勒爾特別憤慨，在他的著作中，我甚至沒看見有毫髮獨創的、深滿的思想。……他的著作，除開認識論的煩瑣哲學而外，空無所有。給律師這個字最壞的意義說律師的愚笨，「定義」和愚笨「結論」是他的著作中所有的特色。我讀過他的著作後，又讀新語（Novoye Slovo）雜誌上斯特魯夫和布爾加可夫的論文，發見事實上我必須嚴重地評判新康德主義。我不能克制我自己，在我對斯特魯夫（對科學評論“Nauch oye Obzreniye”雜誌上他的論文）的答辯中插入特別對他攻擊的評論。我說「我不能克制我自己」；因為我承認我對哲學上論辯的落後，在我尚未更深地研究那些問題前，我不打算論述牠們。現在我從事研究牠們，以達爾巴齊（D'Holbach）和黑爾維夏（Helvetius）開始，